

京华学术文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丛刊第4辑



文学经典化 问题研究

周以量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华 学 术 文 丛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丛刊

第 4 辑

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

主编 林精华

李冰梅

周以量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林精华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575-1

I. 文… II. 林… III. 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I 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2065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

林精华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2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07575-1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经典理论探讨

阅读经典与我们自身	塔吉雅娜·维涅蒂克多娃(1)
重述经典	张中载(14)
文学经典: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	聂珍钊(24)
文学研究疆界的扩展和经典的重构	王 宁(42)
经典文学作品文本分析的性质、地位及方法	刘俐俐(61)
朗松的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与当下性	史忠义(75)
德勒兹诗学与文学经典的多元生成	麦永雄(87)
王国维的“文学”理念及其对于中国文学	
“经典”的拟议	孟 泽(100)
文学经典在美国大学课程中的衰落	汤姆·莱恩达尔(114)
开放的经典教育与新世纪文学生态	宋炳辉(124)
文学史范式的痼疾:文学的综合性与文学史	
“历史主义”标准化	易晓明(137)

经典作家作品问题

谈阿拉伯文学经典	仲跻昆(146)
古犹太流散写作与希伯来经典	梁 工(15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结构:巴赫金的	
对话理论和阴阳图	克萨娜·布兰克(171)

肖洛霍夫的边缘化和经典化问题	刘亚丁(186)
文学论争之于文学经典化:普希金成为俄罗斯民族诗人的另一种因素	林精华(202)
经典的形成与“暗示”的争斗	
——夏目漱石的理论与创作	佐々木 英昭(228)
村上文学的经典化的可能性	
——以语言或文体为中心	林少华(238)
芥川龙之介的基督教文化情结	冯新华(252)
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左翼文学经典	
作品研究之一	张志忠(264)

经典在异域

英译中国禅诗集:中国宗教文学在美国经典化的	
一个案例	钟 玲(290)
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对《论语》在英语世界	
经典化的贡献	李冰梅(304)
“外国文学经典”教学中,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	
——以“美国文学”教学为例	郭英剑(322)
王尔德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历程——王尔德作品汉译得失	
问题研究(二)	宋 达(333)
从李劫人的创作看中国作家对自然主义文学的	
民族化改写和诠释	吴康茹(345)
《我是猫》在中国的经典化过程	王 成(360)
文学经典化何以成为越来越需要讨论的话题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经典化问题国际	
学术论坛的报告	钟厚涛(370)

编后记	377
-----------	-----

阅读经典与我们自身

塔吉雅娜·维涅蒂克多娃

苏联时代一个著名的陈腐观念就是把苏联夸张地自我描述为“世界上人们阅读最多的国家”。正如绝大多数宣传式的陈词滥调一样,这一观念从未被进行过任何严肃的测试。然而,它所反映的却是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的高度严肃性,这一态度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文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精神宝库和国家的文化支柱。当前,由新媒体的出现和扩张所推动的文学的边缘化,与俄国的社会危机是一致发生的,社会危机只不过使得这一文化上的戏剧性事件——文学边缘化更为严重。

涉足历史也许是一个适当的开始。许多情况(如低识字率、中产阶级的缺乏、市场的不发达等)导致了这一事实:俄国在“学习阅读”方面的主要努力是在一种高度家长式的政教统治的语境下进行的。整个 19 世纪,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如革命激进分子、国家官僚、爱国的民粹派、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出卖”,即文学的商品化方面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一致性,1917 年以后这种反对行为有增无减。人们认为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半宗教性的价值宝库,是一种改善、提高人类和生活的工具,伴随这一观念的是对普通民众的文学品位的怀疑。这两种观念统治着社会思潮,在这种思潮中“消灭文盲”的行动得以发展。大量的农民不得已逐渐

摆脱了农业传统的“常轨”，被推进了一种“新生活”。启蒙计划赋予俄国知识分子以身份认同和使命感，而阅读行为则曾经处于启蒙计划的核心。当时，阅读是苏联政府所关心的中心议题之一，它重新被看作统一、动员和改革的工具，它能够确保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并有助于社会管理。印刷品的极高的声望和对文学的崇拜在 20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得以继续，甚至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目睹了规定性的、政治上正确的阅读内容与普通民众对更为吸引人的、多样化的通俗形式的要求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矛盾的大量迹象（如“阅读赤字”、“阅读饥荒”等现象）。在苏联体制瓦解之前，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阅读和文学恢复了热情，并视之为一种“公共事业”，阅读和文学暂时地将精英和普通读者凝聚在一起。“每个人”都着迷于原来被压制的东西，通过阅读呼吸着自由的气息。^①截止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市场化的驱动和迅速发展的视觉以及电子媒体开始主宰人们的阅读行为。人们开始读得越来越少，或者阅读不同的材料，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阅读。因此，阅读行为的惯常模式被边缘化了，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替代方法。

① 在探索 20 世纪“俄罗斯阅读神话”的发展、对比“俄国案例”与“西欧模式”时，英国社会学家斯蒂芬·洛弗尔将前者描述为“极度反常的”（《俄罗斯的阅读革命：苏联时代和后苏联时代的印刷文化》，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2000 年）。苏联社会不会允许它的文化反映和公开地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它坚持了社会统一、同质化的模式，以排除任何其他模式。当前的反商业风气更巩固了这种效果，它有助于把阅读塑造成一种迷信、“魅力”和崇拜；这并非不讨阅读教授的喜悦，因为它支持人们相信俄罗斯人民的统一和特殊的精神深度（精神性）。有趣的是，洛弗尔试图在他的著作所重建的“普通苏联读者”的形象，是由否定性的特点组成的：“他不是积极进取的无产阶级，他对通俗的体裁如童话、冒险故事都没有任何的品位，他也不能分享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事实上，他很难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既非偶像破坏者，也非坦率的保守派；尽管他有政治意识的，并积极支持苏联，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准确的阶级效忠并未得到重视”。对我而言，对广度、“合并”和多功能性的强调，与其说意

走近学术场合,我们观察到一个一开始就可能是令人瞩目的悖论:国家对“普通读者”的持续赞助和对文学教育的足够强调,还没有造成对阅读美学的任何严重关注。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学生被给予关于文本的知识,但很少或根本没有获得一种激励来分析发生在读者(即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作为行为和过程(这在本质上是个人化的,然而附着了社会色彩)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被研究——这是对当代文学和文化学者提出的一个挑战。

在这方面,俄国的学术语境也与西方人文学科的情况形成了对照:在西方,从70年代以来,阅读活动一直是(接受美学)详尽、系统的关注对象。作为一种被广泛参与的趋势,“读者转向”是与同时期产生的其他见解(比如对文学话语的主体间性和社会性的承认,对日常生活的象征性消费和相关习俗的新兴趣等)相伴随的。读者反应批评与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种学、人类学发生了有效的、显著的联系,因而扩展了自身的范围以形成创造性的“外延”。结果是,今天我们拥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阅读活动研究机构——我们把阅读活动理解作为一种占据现代文化中心地位的现象,一种与人类主体性密切相关的现象,一种彻底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现象。

尽管把阅读视为一种由“自我扩张的人类欲望”^①所形成的活动的理论方法已不再是新闻,但是,它与社会知识、教学法的充

(接上页①内容)意味着事实真相的缺乏(意识形态的构造与之并不相符,这一事实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倒不如说意味着虚构的“欲望的真相”。激进的苏联试验(即将大量的新的识字的阅读公众暴露于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化,因而“用铁的手腕”强迫所有人阅读最优秀的文本)依赖于深深植根在俄国传统中的乌托邦神话的基础。然而,它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却被证明是不可预测的和“不调和的”。“迄今为止,在现代世界上从未出现过‘高雅’文学引起了普通民众如此热烈的响应的情况。”(第75页)——关于前苏联,斯蒂芬·洛弗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然而,正是同一批普通民众和“博学之士”似乎越来越感到不满。实际上,拥抱一个神话是一件喜忧参半之事。

① 沃尔夫冈·伊瑟尔:《我是为读者而写吗?》,载《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2000年,第115期,第310页。

分结合仍然是一个挑战——即使是在西方背景下,在俄罗斯肯定如此。作为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一名文学教师,我每天观察——同时参与着不同阅读方式的接触和紧张关系,它们“迫切地”要求被鉴别和比较,期待着批评性的意见和分析。

正如当代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一样,俄罗斯正面临着如何使自己重要的过去(即古典传统)变得重新可用。经典化可能意味着把一个文学作品具体化为某种曾经很好地使用过的典型——它被便捷地掏空、仪式化地崇拜或者拆穿假面——不被阅读。它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通过阅读和阐释进行再创造的过程——即重复和变化的过程。正是在涉及到第二个过程时,读者的角色得以凸显,并以其双重角色——作为文化产品和重要的文化媒介——召唤了问题的产生。

我的论文致力于讨论三种类型的阅读,正是它们有力地推动了目前俄罗斯教育文化中的经典化和“竞争”:第一,作为崇拜的阅读;第二,作为技术的阅读;第三,作为自我反省和行为习惯的阅读。长期以来前两种类型已为俄罗斯传统所熟知,第三种类型目前正在出现,并开始被看作文化辩论的焦点之一。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所以并不打算通过测量和数据来鉴别这些阅读行为,而是尝试通过我在莫斯科大学做(外国)文学教师的经历中所收集到的轶事趣闻性的证据来分析阅读行为。

通过对比可以敏锐地感受到三种类型之间的差别。我清楚地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作为一名交换留学生来到美国,怀着焦虑的心情前去参加我的第一次文学研讨会,心里不能确信我在俄罗斯所受的教育是否使我具有足够的学识。然而,文化震荡却来自别处,而且是由一些微小的细节所引起的——比如,在讨论文本时教授频繁使用的(对我而言)陌生短语:“它是如何起作用的?”(How does it work?),或者同学们经常使用的短语——以“我觉得”(I felt)开始。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措词给我留下的印

象都是荒谬的“错误”，言不对题、语不得体——因为它们与我所接受教育和融入的社会的阅读文化不可调和（正如我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第一个短语似乎暗示着用“科技的”方法去阅读文学文本——几乎把它看作一个机械玩具，可以被拆分和重新组装。第二个短语在我听来（有时候是这样，事实也证明如此）是一种粗鲁的直接的表达方式和幼稚的情绪化的反应。这两种态度都与文学阅读无关——文学阅读与虔诚的沉思关系更为密切。我所认为的合理的、可以用于（相反的）比较的阅读，更像是圣餐，强烈而“虔诚”，意味着一种“超验”的承诺，并把读者带入作为统一性的、有着特殊的和被人们所共享的意义领域的文化。

十五年多以后，在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的背景下，我获得了一个有趣的机会来以批判性的眼光回顾年轻时的我，而且目睹了这种阅读观念的持久的吸引力。一位美国同事、富布莱特访问教授和我计划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开设一门当代文学理论课。可以预见的是，这门课程是由一系列批评方法的介绍而构成，这些批评方法可以被用于分析某个文本，也可以展示出它们如何在操作层面被使用。我们一致同意这个文本应当是《汤姆叔叔的小屋》——我们认为它“正合乎我们的目的”，因为它（作为文学经典或者作为儿童文学）学生们都熟悉，然而它却没有出现在中学和大学课程的阅读书目中，因此它是一个可以用于实验的、合适的崭新话题。的确，这门课被证明是在跨文化交际（误解）方面的一个试验——因为事实证明教师和学生的期待、预想、阅读策略之间存在着微妙然而重要的分歧。最令我感到意外的一件事是，在美国学术环境中经过很好试验的、显而易见并成为常规的以某种批评视角分析文本的做法，在俄国学生中引起的不仅仅是陌生感，还有抵制情绪：他们中最善于表达的学生试图尽最大努力提出最好的

理由。我能提供一位学生的反应^① 作为例证(极具特点的是,该反应包含了这名学生对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方式”的前见,她几乎没有关于“美国方式”的直接知识)。以下是她的陈述:“以我的想象来看,一所理想的美国大学的独特性在于它需要理想的学生,最好他们并没有被早期的(经典的或其他的)阅读所妨碍。”因此,自然而然的,他首先会被《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这本书教会如何阅读,然后他会阅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或者艾米丽·迪金森的诗,一份报纸或者一张街头广告。他已经学会了如何质疑既定的价值观的等级和如何解构它们,他完全不受文化障碍物的约束。然而,(即使现在)俄国大学也会预先假定学生入校前已经读过某些作家的作品。当然,他们会试图对学生进行再教育,但这或许已为时过晚:一名学生可能已经养成了对阅读的热情,他对某一特定作家的充满好奇心的偏爱会超越这一“文学过程……”^②

我们在此所观察到的似乎是处于鼎盛时期(这是有争议的)的俄罗斯“阅读神话”。阅读被描述成一种“有机的”文化技能,它几乎“凭空”获得,或者作为家庭遗产而被获取,而不是从课堂或其他官方语境中得到——这就可以解释人们对学术权威们的一片傲慢的讽刺声音——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学术权威都干预(阅读)这种精致的艺术,他们企图把阅读缩减为一套现成的理论框架。阅读行为表达了对有知识的作家的崇拜,因而成为俄罗斯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它被用于定义“我们”以区别于“他们”。

在以后的岁月里,这名学生进入了研究生院,写了一篇比较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她现在是与我在同一个系工作的同事。当我

① 关于教学经验(包括学生的观点)的描述和讨论发表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学报》(语言文学),1995年第2期。

② 见《国立莫斯科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128页。“文学过程”是前苏联文学话语中的观念之一。

最近问她是否记得她大学二年级时我们的那次偶然相遇,问她此后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对我的第一个问题她的回答是一个斩钉截铁的“是的”,对第二个问题她的回答是几乎同样斩钉截铁的“没有”。她的立场本质上并未发生变化,伴随她立场的感觉也没有改变。在这位作者看来,按照一系列的理论/工具视角对一个小说文本进行研究的做法看仍然是值得怀疑的,无论从美学的还是从道德的立场上看都是如此。她发现与理论相关的——相对论的——教学法策略从道德上来看是令人怀疑的,从知性上来看是折衷的,因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学习和阅读活动中的真正意义。她愿意这样描述它真正的本质:“任何批评理论都应当从属于文学——有时候(并非罕有地)应当从属于一本书。有些理论应当为了拉伯雷而被创造出来,另外一些理论应当为《神曲》而创造,有的学者可能是赫列布尼科夫的支持者,另一位学者可能是荷尔德林的支持者。如果一个人想要保持诚实,那么这种等级就应当被尊重,对它的必要的服从就应当被维持……”从这种观点来看,“谦虚的”比彻·斯托和任何理论家之间就会永远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深渊——无论她是如何有名,因为必然地,有人统治,而其他人则卑躬屈膝、使自己适应皇家的人身攻击(如果有人取消了这种等级划分,文学艺术就会失去生命)。^①

这位年轻的读者/教师所喜欢、依赖和赞扬的阅读方式,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个人投入。读者通过自己的热情投入和同情性理解表达了对作者超凡魅力的尊敬,然而,工具主义的方式,即理论映射的操作方法(因而使文本“从属”于理论)被视为双重地可疑:它既表现了对作者个性之缺乏尊重,又危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文化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一位阅读课老师忠诚于自己的职业,那么他或她所追求的就

^① 经过作者的同意,这段话引自她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

不亚于一位文化教士的精神境界。读者被召唤而参与某些“信条”，并由此获得了身份认同；这种“信条”的范围十分广泛，它既可以是复杂世故的，也可以是低廉的：从对赫列布尼科夫或荷尔德林的精英崇拜到大量生产的一套初级的经典文本，随处可见。

因此，我们值得访问一些较少精英色彩、更多平民特点的阵营，为此，我们可以研究一家专门为中学文学教师所编写的期刊：《文学在学校》(Literature in School)。迅速翻阅该刊过去三四年间的许多期杂志，我只发现了为数极少的有关阅读的材料。这些材料非常一致地把阅读视为一种能够产生信念的活动——灌输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传统的尊敬，认为它在当前的价值危机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来自布里亚特的教授叶·切里科娃的一篇题为《阅读是一件爱国的事业》的文章可以作为这类修辞的一个例子。她对“学生们仅仅用一本英语语言手册武装自己就进入生活”表示痛惜，强调了文学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巩固国家的资源的重要性，并以关于《战争与和平》中一个战斗场景的引文作为文章的结尾，意在展示“我们的”这个词在重要的价值观念、理想方面的意义。

从该刊物的字里行间所找到的来看，对于这种“爱国事业”的合理逻辑，人们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由一位乡村教师的强烈的呼吁所代表的（见 2005 年第 2 期《文学与教学》杂志），表达了她对（文学与教学之间的）这种巨大裂痕的震惊和无助，如果她在课堂上所必须“覆盖”的“整套经典”与她的学生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必须争取的实际需要之间不是完全疏离的话。要使阅读（文学）变得有意义，就必须以某种新的、不同的方式进行训练和教育，但是如何做呢？第二种选择（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的一个例子是国立莫斯科大学教授纳·达·塔马尔钦科的一篇题为《他们在学校如何教作文……》的文章（见 2006 年第 2 期《文学与教学》）。这篇文章提出了作文、写作、还有阅读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被认为等同于“大多数年轻人无法认识到他们的与生俱来的表达个人观点

和对所读材料进行独立判断的人类智能和倾向”。如果我们把阅读视为社会行为的一种缩微模式,这种困境的根源可能会被定义为学生们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自由。

年轻的读者们所呈现出的,“要么是许多杂乱无章的个人评价和观点,通常只是纯粹的自我表达,而与正在讨论的文本几乎毫不相关;要么是对某个权威的明显服从”。后一种态度可能与(大概已被抛弃的)苏联习惯有关,而前一种态度与新的(大概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方法有关。实际上,在塔马尔钦科教授眼里,这两种态度是相似的,因为二者都表明(他们)无力做出独立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评价。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青年发现他们自己的声音呢?塔马尔钦科将希望寄托在形式主义的“技术”上——训练学生理解文本的典型形式、规则的构造方法。一旦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操作”技巧,他们还不会被某个文学名著的独特性所征服吗?这难道不是一种训练新读者并使之变得更为善于表达的办法吗?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介于作为崇拜的阅读和作为技术的阅读之间的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似乎就是正确的选择。实际上,两种方法(一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另一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都优先考虑了专业性的、权威性的阅读方式,“普通读者”注定要模仿这种方式。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被教会将文本视为一个对象——或者作为崇拜性的同情性理解的对象,或者作为技术性修复的对象。在两种情况下,陈旧的阿诺德式的文学理想(把文学看作有规范功能的文化因素,把文化看作一种普遍规则)在背景中隐约出现。当然,从本质上看,这种信条/态度并没有“错”,除了(以我看来)它使得教学、学习策略与目前的文化状况不相符合。

当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就是,作为一种学术领域,“文学”正在缩减(这是高级学者们所倍感痛惜的一个过程);然而,作为一种媒介,它似乎在繁荣发展,并扩展为各种混杂的形式(如录像、声

音、电子等)。目前俄罗斯的大多数“阅读课教师”仍然没有准备好将这种危机看作一个新的机遇。

文学领域的生产者、专家与文学的消费者(即实际的“使用者”)之间的新的权力平衡凸显了对长久以来被称为“幼稚的”阅读——即搬出专家们倾向于轻视、禁止或嘲笑的文学文本进行阅读的模式之重新确认。似乎这些模式中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不能遵守和维持阅读主体与文学文本之间的适当的(即通过教育和共享的习俗变得常态化、得以控制的)距离。这一不足导致了肤浅的、分散的、触觉化的(例如照字面意义理解“吃”一词)认识,并具有直接冲击的本质,而且导致了人们无法将虚构想象的游戏与个人经历的结构区别开来。(欢笑、眼泪、恐惧等)情感反应的力量似乎能够阻止人们的思考,给思考留下极小的空间;然而反常的是,同时给令人分心的事物和即兴性的个人计划留下了太多的空间。直到现在,这种仪式的缺乏,即对待文学文本时对(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从属关系的明显背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只有在先锋派实验的语境下或者在对待亚文学的“垃圾”时才可以被接受。然而,今天在论及“严肃文学”时,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熟悉的东西,包括通过新技术带给读者的经典。对文本的任意使用引起了文学文化的“捍卫者”的极度关注(通常是不无道理的),他们无可奈何、深感怅然若失。结果是,“课堂的”阅读类型和“未受学校教育的”阅读类型之间变得日益疏离,这只会导致文化上的损失。

作为这一过程的一个视觉例证,我愿意引用最近在俄罗斯电视上播映的一个“MTS”(即移动通信系统)广告。这则广告中的故事是关于两个朋友兼同学的,他们中的一人正在参加(假定地)文学考试,而另一人正巧妙地帮他作弊。这种情景被定格在两种学术背景中:一端是放在书架上的卷帙浩繁的文学选集,而另一端则是大学考试的规定形式。亚历山大·勃洛克一首诗中的著名的四行诗句出现在了书页上,以人(即那位“帮助者”)的声音具体表

达出来,并被解码成电子信号,然后这些诗句穿过(被象征性地视觉化为一道流动的线条)繁忙的、熙熙攘攘的城市场景,再转化了接听者耳中的声音,最后变成了一支圆珠笔下跃动的图形符号:在这里,MTS系统扮演了一个反传统的缪斯的角色。这则广告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并引发了学界们的抗议,他们认为将经典文学用于商业目的(同时也赞扬作弊行为)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人们会轻易地假定相反的东西:或许正是由于这则广告,许多人记住了或者第一次听到了这首诗——以后他们肯定会记住这首诗。这种“低俗的”广告媒体可能起到了一个强有力的介绍者的作用,使诗歌在文化空间中具有了新的流动性——这也许是一种冒险的、危险的“新生命”,然而作为一种珍藏品它更适合于人们纯粹的记忆。

与这一工作相关的是最近的一个重新发现:“文学”与“行为”具有相近的意义。以接受为导向的研究已使如下的文学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文学是一种“对词语的行为化的使用”——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双重行为,因为它也引起了反应,即读者的行为性言语行为,来回应作者的语言。实际上,它甚至可以是一种三重行为,因为它会间接地引发社会行为,使得“事情(以读者的方式)发生”。^①

把阅读文学作品视为一种行为的做法在空间中得以扩展,读者把这一空间定义为她自己的,然而也是属于其他人的空间;这个空间对她来说是陌生的,然而只有在参与的过程中它才会变得熟悉。一位作家在一张白纸前坐下时自己所想象到的那种“绝对自由”对读者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概念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当我阅读时,我走出了自己的城堡而进入了另外一个人的领地,我被另一个人的词语和意识所占据,我思考着我自己的、但并非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思考着另一个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同时也是

① J. H. 米勒:《论文学》,伦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第37,20页。

我自己的)。作品中人物所说的最简单的一个词也必须(实际上不可能,但的确如此——由于文学语境的本性)相当复杂地语境化——就像在文本中对某个人物所说的话,同时也是对读者所言,因此,这句话至少就具有了两种可能截然不同的含义。文本中同时也存在着叙述者和作者,读者会发现她与作者之间有着详尽的间接交流。当被看作一种行为或一个过程(或者用另外一个比喻——“接触区”)而不是一个对象时,即使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文本也会变成一个复杂的冒险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者每一步都感觉到压抑、被激活、被控制,也面临着因为行使她的自由意志而带来挑战。如果阅读帮助发展我们的内在现实,它也是一种训练场地,能够使我们具备对社会现实的适应能力,并激活我们在异常复杂的情况下的定位、负责任的选择和临时行动的潜能。米歇尔·德塞尔托的著名的比喻——将读者比作在作者所定居的、有效控制的土地上旅行的偷猎者(或者移居者? 修补匠? 流浪者?)——容许我们以“政治”安排和互动(在全世界推进迁移的过程,这与当代世界的现实不同寻常地相似)的方式思考这种关系。

作为一种活动,阅读继续保持是普遍的和经常变化的,但是它被“荧屏文化”严重地抑制甚至边缘化了。尽管它既不壮观,也无涉“世界历史”,然而,作为一种个人化的社会行为,它仍然与(对社会的)分析密切相关。以这种角度探究所得的有关文学的关键事实是:它容许、并使得媒介与他者的交流成为可能、得以进行。将这些过程视为文化造成的(投射到微观层次的)习惯行为或许会有助于一种有益的、有见识的教育方式。通过意识到我们在某个文本中的行为参与,我们得以“演练”因而更好地理解我们在社会中参与的复杂性。

就像在今天被教会和理解的那样,读写能力需要包括读者阅读他/她自己的能力和辨认多样化的阅读方式的能力。对我们而言,无论我们所继承的或者娴熟地练习的读写能力是多么的自然,